

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志高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 江苏南京 210004)

No. 6 Tomb at Songshanli, South Korea like Wuning Mausolin, belongs to the typical "Jiankang Pattern". The tomb comes after Wuning mausolin, the owner is probably Baiji Holy King, the son of Wuning Emperor. The four supernatural beings painted on the walls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China) painting skill. The appearance of "Jiankang Pattern" in Baiji (South Korea) should be related to its wish to be affiliated to China in the 6 year of Dongchen Emperor, which may also be one of rule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Gongzhou South Korea No. 6 Tomb Songshanli "Jiankang Pattern" Baiji

内容提要 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的形制结构与武宁王陵一样属于典型的“建康模式”,其时代比武宁王陵略晚,墓主推测是武宁王之子百济圣王,墓壁发现的“四神”壁画明显受到南朝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建康模式”的砖室墓在百济葬制中的植入,应与百济东城王六年遣使中国南齐要求内属有关,可能是百济内属时期的制度规定与要求之一。

关键词 韩国公州 宋山里 6 号坟 “建康模式” 百济

中图分类号 K883/887

文献标识码 A

韩国公州宋山里 6 号坟是一座重要的百济古坟,它与著名的武宁王陵一样,采用了典型的中国南朝砖室墓葬形制结构,墓壁还发现了罕见的“四神”彩绘壁画,对公元 3~6 世纪中、韩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然因此墓系 20 世纪 30 年代由日本人挖掘,且早年被盗,随葬文物一无所存。对它的综合研究,韩国、日本学术界虽有一些论著涉及,但是限于条件,远不及武宁王陵深入、全面,甚至关于它的具体时代及墓主身份还有较大争议,中国学者更迄无专文涉及。本文拟在全面比较宋山里 6 号坟与武宁王陵以及中国南方东晋、南朝墓葬形制结构异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它的具体时代、墓主身份以及“四神”壁画的渊源,进而结合文献记载,探讨此墓建筑工艺技术传统的复杂性,以及这类特殊的砖室墓葬在百济古坟中的地位问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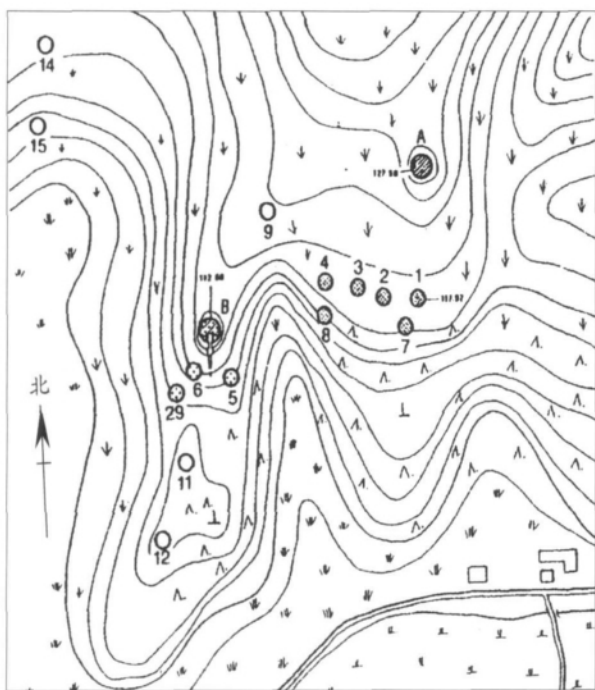
一 宋山里 6 号坟形制结构的特殊性

早在 1932 年 10 月,已在宋山里 5 号坟西侧发现 6 号坟的砖砌排水沟;次年 7 月,又在距离排水沟北端约 25 米的地方发现此墓的砖砌封门墙

及早年遭盗掘破坏的甬道顶部。同年 8 月,遂由日本人藤田亮策和小泉显夫对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由于宋山里 6 号坟未经严格意义的正式考古发掘,故有关资料的科学完整性不比武宁王陵^[2]。

宋山里 6 号坟从属于以武宁王陵为中心的一个独立墓区。在这个墓区中分布有 4 座墓葬,其中武宁王陵大体位于该墓区北侧中央位置,无疑是这一墓区的主墓,宋山里 6 号坟、5 号坟则分居武宁王陵神道前的西侧和东侧,29 号坟又位于 6 号坟神道前的西南侧(图一)。显然,这一墓区经过了统一的规划,各墓葬的位置是在一定秩序和制度的指导下作出的安排^[3]。

与武宁王陵一样,宋山里 6 号坟也由封土、墓道、排水沟和砖室等部分构成,但封土、墓道的原始情况已难知其详,仅知在砖室封门墙前的地面上铺有一段略呈梯形的地砖。在封门墙前墓道底部铺砖的现象也见于南京吕家山 1 号墓^[4]。它的排水沟从甬道底部铺地砖下穿过封门墙,一直通向墓前山体边缘,长约 20 米,在砖室前的部分应位于墓道的底部中央。排水沟系在山体上开挖沟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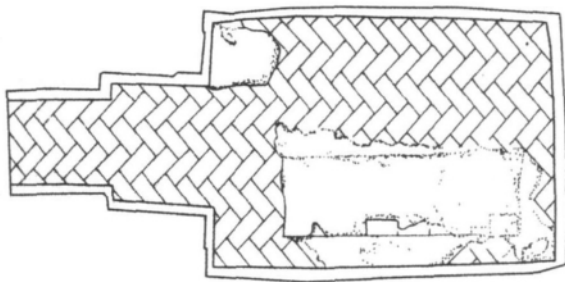


图一// 宋山里6号坟位置示意图(图中B为武宁王陵)

再在沟槽底部砌砖,砌法为下有一层纵平砖,以上两侧各为一层纵平砖,中央留有泄水孔,其上覆盖两层纵平砖。排水沟的这种砌法与武宁王陵基本相同,在南京地区六朝墓中更是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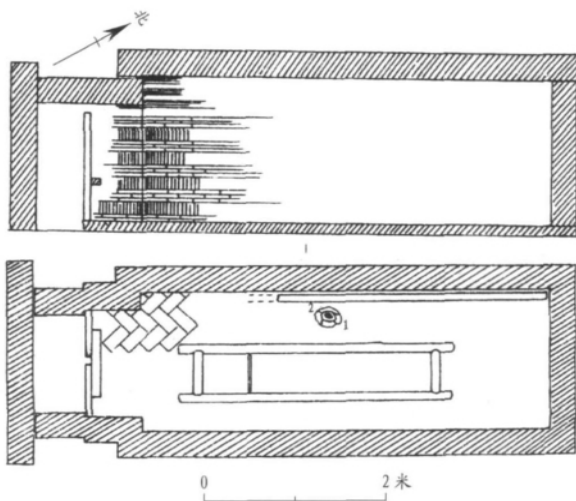
宋山里6号坟砖室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前设长甬道的单室券顶结构,由封门墙、挡土墙、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封门墙砌于甬道口内外,全部用顺砖平砌,门券上部砌有较高的挡土墙。甬道的砌法与武宁王陵颇不相同。武宁王陵虽在甬道后部与墓室交接的地方设置了一道简易的木门,但木门前后甬道的宽度和高度完全相同。宋山里6号坟甬道基本位于墓室前部正中,全长2.3米,分前后两段,两段的宽度与高度都不一样。前段宽0.8、高1.32米,后段宽1.1、高1.49米。此墓甬道前后分段的原因,学术界未予关注,其实这是因在甬道分段处设置木门的缘故,木门易朽,故发掘时已不见遗存(图二)。类似的这种甬道砌法和木门设置的方法在南京地区东晋及南朝刘宋早期墓葬中颇为常见,如象山7号墓^[5]、温峤墓^[6]、郭家山5号墓^[7]、前新塘南朝早期墓^[8]、苜蓿园2号墓^[9]、尹西村2号墓和3号墓^[10]等都属此例。这些墓葬都以木门为界把甬道分为前后两段,不过与宋山里6号坟相反,它们的前甬道的宽度和高度都大于后甬道,只有江宁下坊村东晋墓等少数墓葬后甬道的宽度大于前甬道(图三)^[11]。

宋山里6号坟墓室为长方形,内长3.7、内宽



图二// 宋山里6号坟平面图

2.24、高3.13米,侧壁和后壁平直略外弧。墓室东侧设一长方形砖砌棺座,棺座由三层纵平砖砌筑,区别于武宁王陵在墓室后部铺设砖砌棺床的作法。墓室侧壁和后壁共设置7组直棖假窗和火焰形灯龕,其中两侧壁各相间布列3组,后壁中央设置1组,灯龕均由两块特型砖相拼而成,其边缘用朱红和青绿两色描绘灯龕的轮廓线和火焰纹^[12]。直棖假窗与边缘彩绘火焰纹的灯龕虽在武宁王陵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建康地区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中同样发现,但在具体数量和配置方法上有所区别,后者墓室侧壁和后壁共设5组直棖假窗和火焰形灯龕,两侧壁各比宋山里6号坟减少一组。另外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宋山里6号坟各组火焰形灯龕均在直棖假窗的下方,且排列亦不整齐,有在假窗正下方的,也有偏置一侧的,而武宁王陵和南朝墓葬火焰形灯龕均在直棖假窗的上方中央。灯龕在直棖假窗下方的南朝墓例,唯见湖南长沙烂泥冲南齐永元元年(499年)墓的墓室后壁,但此墓灯龕为简单的长方形,假窗的直棖多达15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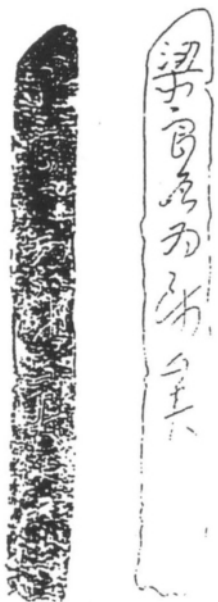
图三// 江宁下坊村东晋墓平剖面图

[13] ,与上述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以及南京地区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没有直接关系。

宋山里6号坟墓壁、墓顶和铺地砖的砌法也与武宁王陵和南京地区东晋、南朝砖室墓不全相同。它的墓室前后壁和侧壁由下向上分别以十顺一丁、八顺一丁、六顺一丁、四顺一丁组砖砌筑4组,以上再用顺砖平砌起券至顶。甬道的顶高因为不及墓室,底部两组砌砖与墓室相同,其上后甬道为一组四顺一丁组砖,然后顺砖平砌起券至顶,前甬道则为一组二顺一丁组砖,再上亦为顺砖平砌起券至顶。墓底铺地砖一层,均为斜人字形平铺。武宁王陵墓壁和墓顶主要用四顺一丁组砖砌筑,只是在接近墓顶的部分使用少数几组三顺一丁组砖。

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券顶砖室墓则多以三顺一丁组砖砌筑。但三者以顺砖和丁砖交替砌筑的原则无疑是一致的。它的地砖铺法与武宁王陵及南京地区自孙吴以降的大多六朝墓葬相同,唯武宁王陵甬道内铺地砖前后各以一排竖平砖锁口,这一现象不见于宋山里6号坟和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

关于墓砖,宋山里6号坟也有长方形、楔形、刀形三类,各类墓砖的用途与武宁王陵完全相同。大多墓砖的侧面和端面模印有各类花纹,且有花纹的一面均朝向墓内,故整个墓葬内壁显得富丽壮观。与武宁王陵甬道和墓室大量使用各类莲花纹不同的是,宋山里6号坟仅在封门墙中的一块楔形砖的窄端模印有莲花纹,而甬道和墓室内壁大量使用的则是武宁王陵挡土墙上少量发现的花纹类型,所见有在长方形砖和刀形砖的侧面模印菱形与四出钱纹的组合纹或对角线纹,在长方形砖的端面模印双四出钱纹,在楔形砖的窄端模印单四出钱纹,等等。除花纹砖外,还发现在一些墓砖的端面模印有文字,如“急使”、“中方”、“使大”等,这些文字砖与武宁王陵中所出同类墓砖相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前述于封门墙中发现的唯一一块模印莲花纹的楔形砖的侧面还刻划有一行草书铭文“梁官瓦为师矣”,可能系制砖工匠在砖坯未干时用锐器信手刻就(图四)。与宋山里6号坟类似的文字砖、花纹砖,乃至它们在墓壁上的砌



图四// 宋山里6号坟发现的铭文砖

筑方法都常见于建康地区南朝中晚期大中型墓葬。关于两者的详细比较,可参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一文,兹不赘述。

综而言之,宋山里6号坟无论墓道、砖砌排水沟的设置,封门墙、挡土墙、以木门分为两段的甬道、墓室、直棂假窗、火焰形灯龕的砌筑,乃至墓砖规格、铭文、花纹等都能在建康(南京)地区的东晋、南朝墓葬中找到渊源,尤其是墓室内壁所见的火焰形灯龕迄今惟见以南京、丹阳两地为中心的都城建康地区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之中。因此,它的形制结构与武宁王陵一样亦可称作典型的“建康模式”。然与武宁王陵相比较,两墓在形制结构上虽有许多相似性,但在墓葬规模、甬道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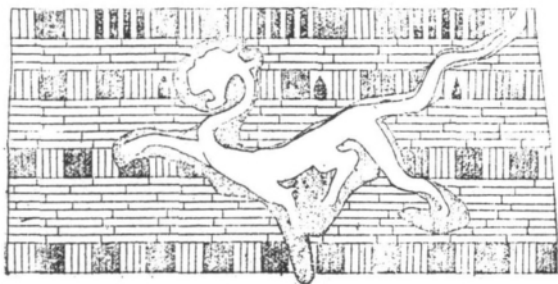
段砌法、木门的设置、墓壁和墓顶的砌法、直棂假窗与灯龕的具体数量和配置、棺床和棺座的选择、花纹砖以及下文述及的墓壁装饰等不少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它与墓葬的具体时代、墓主的身份地位以及不同国度之间文化传播的特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将是我們后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宋山里6号坟“四神”壁画的渊源

武宁王陵与宋山里6号坟最明显的区别还有墓室内壁装饰的不同,前者墓室仅用各类花纹砖装饰,而后者则较复杂,不仅在各类花纹砖的表面相间涂饰黑白两色漆彩,装饰整齐而有规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墓室四壁装饰的“四神”壁画,东、西两壁中部所绘分别是头向墓门的青龙(图五)和白虎(图六),南壁甬道入口上方中央所绘为朱雀,两侧还有日、月和云纹图案(图七),北壁火焰形灯龕



图五// 宋山里6号坟墓室东壁所绘的“青龙”壁画



图六// 宋山里6号坟墓西壁所绘的“白虎”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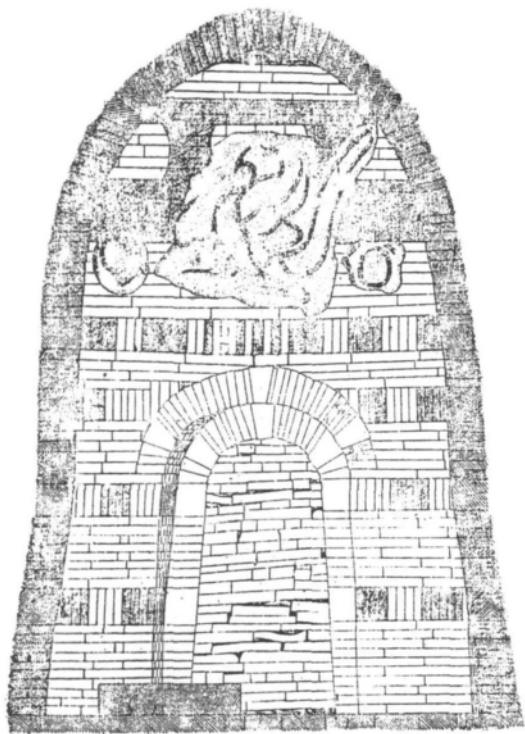
下方中央所绘为玄武(图八)。这种“四神”壁画在百济古坟中十分罕见,以往所见仅抚余陵山里东下冢。东下冢是一座石室墓,由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墓室长3.21、宽1.6米。在其墓室的东壁、西壁、北壁及南壁甬道入口上方亦分别绘有青龙、白虎、玄武和朱雀,墓顶上还绘有莲花、云气等图案^[14]。

关于这类“四神”壁画的源流,过去学术界考虑到文献记载中百济与中国南朝密切的政治关系,一般认为是受南朝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但随着高句丽古坟壁画的不断发现,近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相信这类“四神”壁画乃与高句丽有关,故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澄清。

百济虽与高句丽接壤,但两国差不多一直处

于敌对状态,战争几乎没有停歇,特别是盖鹵王二十一年(南朝宋元徽三年,475年)秋九月,高句丽长寿王率兵3万围攻百济都城汉城。城陷,盖鹵王被杀,百济被迫南迁都城至熊津^[15],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百济墓制竟然接受高句丽的影响使用了“四神”壁画,则让人匪夷所思。另一方面,高句丽古坟壁画自成系统,其绘画题材广泛,色彩艳丽,主要有墓主画像、车马出行、狩猎、仙人、侍女、供养人物、殿阁、门将、力士、珍禽瑞兽、擒敌斩首、星象等等,大约继承了大陆中原以及东北地区东汉、魏晋墓葬壁画的传统,也与同时代的北魏、北齐墓葬壁画关系密切,其中虽然屡见“四神”之内容,但显然处于从属地位,与宋山里6号坟、陵山里东下冢壁画内容简约,“四神”占据壁画唯一主体核心位置有着霄壤之别。总之,包括宋山里6号坟在内的百济古坟中的“四神”壁画不可能与高句丽有染。寻找它们的渊源,只能把视线转向与百济长期友好亲善的中国南朝。

已经发现的明确的直接以彩绘壁画的形式来装饰墓壁的南朝墓葬并不太多。南京西善桥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最为典型,此墓墓室内壁先涂一层厚约5毫米的石灰层,其上有断断续续的以红、



图七// 宋山里6号坟墓前壁所绘的“朱雀”壁画



图八// 宋山里6号坟墓后壁所绘的“玄武”壁画

黄、绿等色彩绘的壁画,惜其内容因潮湿漫漶不得而知^[16]。与其相似的现象还见于南京灵山南朝大墓^[17]。从笔者在南京地区近 20 年的六朝墓葬考古的实践看,其他一些大型南朝墓内原来可能也有彩绘壁画,只是因为南京地下水位高,壁画不易保存和发现而已。建康地区的一些大型南朝墓曾经流行彩绘壁画,这一点现在大致可以肯定。由于南京象山、老虎山等一部分东晋砖室墓内壁也见有涂施石灰的现象,我们甚至怀疑其上原来可能也有彩绘壁画^[18]。

与彩绘壁画相关的还有南京、丹阳两地发现的多座大型南朝墓内发现的大幅砖拼阳线刻壁画。这些砖拼壁画皆以数十块以至上百块的画像砖拼砌而成,装饰于整个砖室内壁。目前所见有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19]、西善桥罐子山南朝墓^[20]以及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胡桥吴家村南朝墓^[21]、胡桥仙塘湾南朝墓^[22]。根据研究,这 5 座墓葬的墓主很有可能都为南朝的皇帝,丹阳的 3 座大墓可能为齐的帝王陵墓,南京西善桥的 2 座大墓可能是陈的帝王陵墓。因此,可以推测南齐以降的南朝帝王陵墓使用大幅砖拼壁画可能是当时葬制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座南朝大墓内也见有彩绘壁画的痕迹,如丹阳胡桥两墓的甬道口均发现有彩绘壁画,以青绿色为底,用红、白、蓝三色彩绘四神或龙凤一类图案。甬道内左右两壁嵌砌的“狮子”砖拼壁画表面亦涂彩色,耳、眼、鼻、舌涂红色,两颊涂白色。只是由于潮湿暴露,彩绘多已剥落或褪色。甚至一些花纹砖上也有涂彩。建山金家村南朝墓墓室内嵌砌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拼壁画局部同样发现有彩绘,其中树木和乐器都用红彩涂绘。显而易见,当初这些精美的大幅砖拼阳线刻壁画原来上面都有绚丽的着色,是名符其实的立体彩绘壁画^[23]。

关于各类题材砖画在墓葬中的位置及内容,可以保存较好的丹阳三座陵墓为代表加以复原。从甬道口由外而内,最先是顶部偏东、西两侧分别嵌砌象征天空的“日”、“月”砖画。向内两壁依次为守卫墓门、辟除不祥的“狮子”和“武士”,各为两幅。墓室两壁壁画由外而内分为上、中、下三行:上为凌空飞舞的飞天(或称天人),有两幅;中部西壁为“羽人戏虎”和半幅“竹林七贤”,东壁为“羽人戏龙”和另半幅“竹林七贤”,中部和上部的砖画分别表示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神兽、圣贤以及灵魂升天后的境界;下部两侧各有 4 幅“仪仗出行”砖画,

对称排列,依次为甲骑具装、立戟侍卫、侍扇盖仪仗和骑马鼓吹,共同组成墓主出行的仪卫卤簿。这是中国学者对此类大型砖画表现内容和图案布局的一般认识^[24]。

然而日本学者曾布川宽经过考证认为,上述南朝陵墓中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所表现的并不是引导死者灵魂向天界飞翔的“升仙图”,而是“四神”中的青龙、白虎。龙、虎前侧的羽人是照顾青龙、白虎并诱导它们与之嬉戏的天界仙人。吴家村南朝墓中“羽人戏龙”砖侧发现的“大龙”字样,仙塘湾南朝墓“羽人戏虎”砖侧发现的“大虎”字样,可以为证。而仙塘湾南朝墓中发现的刻有“朱鸟”和“玄武”字样的砖铭,推测原来就在墓室的前壁和后壁。这样,墓室四壁嵌饰的“四神”砖画可为墓主辟邪守护四方,它与甬道顶部的“日”、“月”砖画共同构成了墓室中的宇宙^[25]。曾布氏的上述论断可谓真知灼见。简言之,在南朝最高等级的帝陵中,“四神”与“竹林七贤”、“仪仗出行”等题材占据了墓室壁画的最主要位置,它是砖画所欲表现的最重要内容。

那么,次帝陵一级的南朝宗室王侯和其他高等级贵族墓中彩绘壁画的题材和布局究竟怎样?由于作为典型墓例的南京西善桥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彩绘壁画已完全漫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画像砖墓则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线索。最值得注意的是 1988 年山东临沂金雀山清理的一座砖室墓。这是一座典型的平面呈“凸”字形的前带甬道的单室墓。墓室后半部有砖砌棺床,墓壁用三顺一丁组砖砌筑。墓室四壁嵌有浅浮雕类画像砖,均一砖一画,其中东壁有青龙、白虎,西壁有朱雀、狮子、马,北壁有玄武,另有一种人物图象画像砖散见于以上三壁。画像砖中虽然“四神”布列与方位不完全对应,但“四神”种类齐全,足证是画像题材的主要内容。此墓形制和画像风格与常见的北朝墓迥然有别,而具有南朝砖室墓的一般特征。因临沂在南北朝时期一度属刘宋领辖,故被推定为一座刘宋时期的墓葬,或为年代略晚但受南朝文化强烈影响的北朝墓^[26]。

我们还可把视线向前追溯。建康地区可以确认的东晋时期彩绘壁画墓虽迄无发现,但远在西南的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霍承嗣墓可为参考。此墓墓室四壁和墓顶发现有题材多样的彩绘壁画,除了墓主坐像、众多的侍从仪仗、楼阁建筑、珍禽异兽,以及极具地方民族

特色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部曲形象外,基本按方位布置的“四神”图也是壁画表现的重要内容^[27]。南京地区清理的姚家山东晋晚期画像墓就更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佐证。此墓东向,砖室全长9.05米,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墓内嵌砌的花纹砖和画像砖排列整齐而有规律,其中甬道和墓室北(左)侧画像砖为侍男和青龙,南(右)侧画像砖为侍女和白虎,墓室的后壁见有以上四种画像砖,而在棺床前部的铺地砖中发现一块刻划类的朱雀画像砖。由于该墓墓室后壁上部在清理前已遭施工破坏,故发掘者不排除此中有玄武类画像砖遗失。显而易见,这是一座以“四神”为主要内容的画像砖墓^[28]。要言之,中国南方地区的东晋、南朝时期的贵族墓中一直存在着以“四神”图象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艺术传统,以临沂金雀山南朝墓为代表的边远地区同类墓葬可能受到了来自都城建康的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以“四神”为全部表现内容的东晋、南朝时期画像砖墓或彩绘壁画墓,但我们相信在建康地区这一类型的南朝壁画墓终有发现的那一天!

根据笔者研究,武宁王陵的营建参照了建康地区南朝墓葬的等级制度,使用了次帝陵一级的B型墓葬,与其身份相吻合。同一陵地的宋山里6号坟也不例外,使用的也是同一等级的B型墓葬^[29]。宋山里6号坟中彩绘壁画唯绘“四神”和“日”、“月”图案,不见前述建康地区南朝最高等级的帝陵所置的“竹林七贤”和“仪仗出行”等题材,而与以南京姚家山东晋画像砖墓为代表的贵族墓画像题材大体相符,甚至四神的绘法及布局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宋山里6号坟在壁画内容上反映的墓葬等级和在墓葬形制结构上反映的墓葬等级完全一致。因此,从图像传播的原理看,宋山里6号坟“四神”壁画的渊源应是中国南朝贵族墓中的同类彩绘壁画。

然则从文献记载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在4~6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百济与高句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与新罗的关系也因为领土纠纷战争时断时续,与大陆中原王朝北魏的关系亦颇冷淡,自472年首次遣使请求北魏发兵讨伐高句丽遭拒后,便从此断绝往来^[30],此后两国之间甚至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与百济长期稳定交好的盟国只有地处日本列岛的倭和大陆南方的东晋、南朝政权。据不完全统计,百济向五胡十六国、北魏、北齐、

北周诸北方政权派遣使节仅只5次,而向东晋以降的大陆南方诸政权朝贡累计达33次,在刘宋元嘉年间更是“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31],两国使节的往来可谓不绝于途。综观当时大陆王朝对外的册封体系,百济在南朝的地位一直稳步上升,由东晋一代的“镇东将军”升至梁代的“征东大将军”。相反,自南齐以来,高句丽在南朝的地位则急剧下降,到梁代普通元年(520年)更是跌至百济之下^[32]。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百济与南朝的交往尤其注重制度和文化的吸收与交流。百济不仅使用南朝历法;“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33],而且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向刘宋上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宋文帝)并与之”^[34]。至梁大同七年(541年),更有南朝梁的工匠、画师受邀赴百济。据《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百济》载:“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五》则明确记载百济表请画师是在圣王二十九年,即大同七年。如后所析,宋山里6号坟墓主很可能就是百济圣王,另一座“四神”壁画墓——抚余陵山里东下冢一般认为也是一座泗水时代的百济王陵,其时代还要晚于宋山里6号坟,而在此前的武宁王陵及其他高等级百济古坟中都没有发现这种“四神”壁画的踪影。这不禁使我们怀疑就是大同七年(541年)后受邀的这批南朝梁的画师参与或指导了包括宋山里6号坟、陵山里东下冢在内的百济古坟“四神”壁画的艺术创作。在圣王之后的百济古坟中,“四神”壁画墓应是最高等级的百济王陵。

三 宋山里6号坟的时代及墓主身份

宋山里6号坟中发现的可供直接判断墓葬时代的遗物只有甬道口封门墙中的一块楔形铭文砖,砖铭为“梁官瓦为师矣”。这块铭文砖不同于砌建该墓的一般墓砖,它的窄端模印的是半朵四瓣莲花,不是此墓中常见的各类钱纹,而与武宁王陵中的同类花纹砖十分相似。这样一块楔形砖,本来是应该用来成组相拼砌筑起券以上部分的墓壁和墓顶的,所以很可能是宋山里6号坟筑就入葬墓主后发现预计的封门砖不足,临时从其旁武宁王陵余留的墓砖或其他库存墓砖中挪用的。它的时代虽然可能要略早于宋山里6号坟,但用于界定此墓时代的上限是没有疑问的。换言之,从砖铭上记录的“梁”看,宋山里6号坟的时代显然晚于中

国南朝的梁代。

墓中发现的其他铭文砖、花纹砖和火焰形灯龕也有助于对墓葬相对时代的推定。如前所述,宋山里6号坟中发现的各类钱纹砖及“急使”、“中方”、“使大”等模印铭文砖,不仅皆见于武宁王陵,也与建康地区南朝中晚期大中型墓葬出土的同类墓砖大同小异。特别是墓室侧壁和后壁设置的7个以两块特型砖相拼的火焰形灯龕,更是仅见于南京及丹阳两地南朝齐代以降的帝陵或宗室王侯墓,不见于建康以外的其他地区以及建康地区的东晋和南朝早期墓葬。所以,单从墓砖的花纹、铭文以及灯龕的形制也可推定宋山里6号坟的时代相当于南齐以降的南朝中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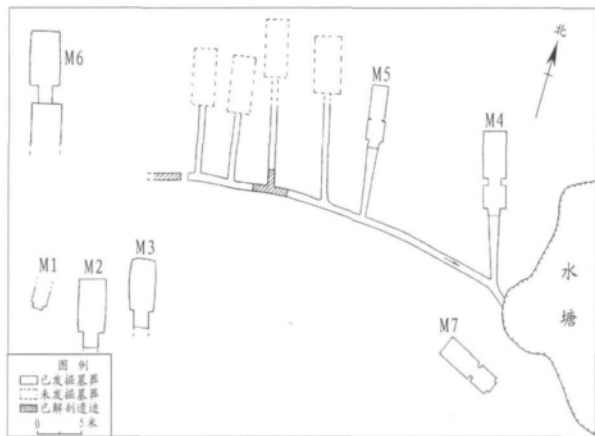
问题的关键是确定武宁王陵与宋山里6号坟的相对早晚。我们首先考察宋山里6号坟在这一墓区中的位置。这一墓区中的4座墓葬大体呈前后三排分布,武宁王陵位于墓地北侧中心位置,其他各墓则均在其前两侧。类似于这种成组分布的墓群在百济古坟中虽然屡见不鲜,但是因为百济古坟中极难见到准确的纪年材料,所以同一墓群中各墓的相对早晚实难确认,它们的分布规律就更难把握。我们不妨参考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建康地区的东晋、南朝墓葬。检索南京地区已有的六朝墓葬资料,可以参比的是与之相似的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35]。该墓地南向,3座砖室墓分前后两排,北侧后排中央的6号墓规模大,时代早至东晋早期,墓主推测是高崧父母丹阳尹高悝夫妇,但因其东侧不远便是孙吴另一世家大族墓地,没有足够空间来营建其他墓葬,故稍晚的2号墓、3号墓只能在墓前瘞埋。又因6号墓前西侧还有另外一座孙吴晚期墓,故此两墓均葬在墓前西侧。其中西(右)侧的2号墓主是东晋中期的侍中、建昌伯

高崧夫妇,东(左)侧的3号墓主被推测是卒葬于东晋晚期的高崧之子高耆夫妇(图九)。在这一墓地之中,显然以后(北)侧居尊,时代最早,前(南)侧时代晚,其中西(右)侧又比东(左)侧时代早,地位尊重,大约遵循的是长者尊者居后、居右的原则^[36]。比之这一排葬规律,则宋山里的这组墓葬中,武宁王陵时代最早,地位最尊,其南(前)侧的6号坟、5号坟均晚于武宁王陵。6号坟在西,又相对早于5号坟。而29号坟因在6号坟西南,时代相对更晚。概言之,这一墓地中各墓时代从早到晚的排序是武宁王陵、6号坟、5号坟、29号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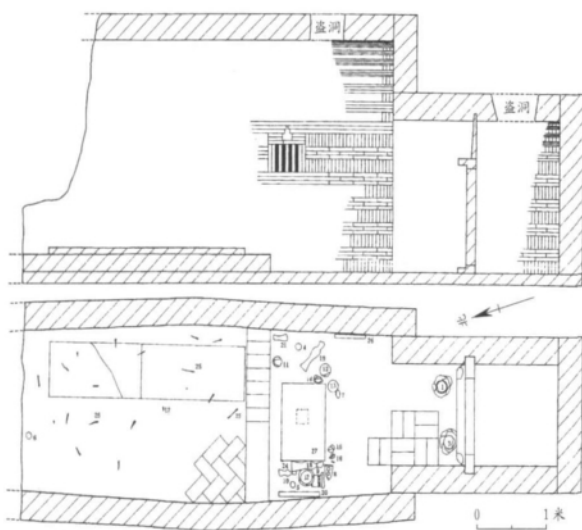
再从墓室四壁装饰的“四神”彩绘壁画看,与之相同的“四神”壁画在百济古坟中迄今唯见抚余陵山里东下冢,而后者公认是定都于泗谿的某一百济王陵。又据前引《梁书》和《三国史记》中圣王向南朝梁代表请画师的记载,我们在前节已经得出百济古坟中发现的“四神”彩绘壁画晚于梁大同七年(圣王十九年,541年)的结论。由此观之,宋山里6号坟的时代亦比武宁王陵晚。

耐人寻味的还有宋山里6号坟墓室中的砖砌棺座。这种砖砌棺座不见于武宁王陵以及宋山里陵地东侧时代相对较早的其他古坟,而独见于同一墓区时代相对较晚的5号坟和29号坟,在抚余陵山里等其他泗谿时代的百济晚期古坟中也发现有与其结构相近的砖石砌筑的棺座,可见砖砌棺座是一种晚出的墓葬设施。此外,武宁王陵墓室中直棂假窗与火焰形灯龕组合的形式与建康地区南朝中晚期大中型墓葬同类构造如出一辙,而宋山里6号坟虽组合的要素相同,但上下排列的方位却与前者迥异。根据文化传播中距离愈远、时代相距愈久、文化特征变异愈明显的一般规律看,也是宋山里6号坟时代较武宁王陵为晚。

关于宋山里6号坟的墓主,因为没有出土可证墓主确切身份的文字材料,亦只能根据有关线索作出推论。此墓墓室东侧设置一处砖砌棺座,其上明显是放置墓主棺木的。这种棺座的渊源颇疑与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石棺座有关。南京地区南朝墓室内绝大部分有砖砌棺床,大型墓葬的棺床上还有石棺座。石棺座一般以2块厚大石板前后相拼,故石板的数量能反映是合葬墓还是单人墓。如果是4块石板拼成两具棺座,则是双人合葬;如果是2块石板拼成一具棺座,则是单人葬。单人葬又视具体情况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如马家店村南朝墓,仅在棺床中央设置一具石棺座,这



图九// 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图十// 隐龙山3号墓平面图

是一种预先规划的单人葬^[37]；一类如隐龙山3号墓，墓室内棺床的大小足够布置两具棺座，但仅在棺床东侧发现一具石棺座，西侧置空为待葬者预留位置（图十）^[38]。这是一种预先规划合葬，但因某种原因未能实施合葬的单人葬。宋山里6号坟与隐龙山3号墓极为相似，它亦在墓室内东侧单独设置一具棺座，说明这是一座单人墓葬，但因其西侧预留的位置足够再放一具棺座，可见也是原来规划合葬，但最终未能实施。这名墓主的性别，可据武宁王陵推导。武宁王陵是武宁王与王妃的合葬墓，据甬道内发现的两方志石（买地券）以及能够判断性别特征的随葬品的位置分析，武宁王葬墓室内东侧，王妃葬于墓室内西侧。由于两人都是头向墓门而葬，故实际上男棺在右，女棺在左，符合自汉代以来大陆以“以右为尊”的礼俗传统。宋山里6号坟墓室内的砖砌棺座位于右首东侧，入葬的这名墓主应该是一位男性。

那么，这名男性墓主究竟可能是谁呢？宋山里6号坟砖室全长虽比武宁王陵略小，但甬道和墓室的高度都要超过武宁王陵，甬道内也设置有一道木门，在建康地区南朝墓葬的等级序列中与武宁王陵一样同属次帝陵一级的B型墓葬。而且它的墓室中还发现有与扶余陵山里东下冢相同的罕见的“四神”彩绘壁画，而后者公认是泗谿时代的一座百济王陵。凡此皆可证明宋山里6号坟的墓主也可能是一位百济王。由于它的时代晚于武宁王陵，故只能使我们联想到武宁王之子圣王。

根据《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的记载，圣王是武宁王的长子，讳明谿，因“智识英

迈，能断事”，而被国人称为“圣王”。他于梁普通四年（523年）即位，于十六年（梁大同四年，538年）春把都城由熊津（今公州）西迁至泗谿（今扶余），并改国号为“南扶余”。圣王三十二年（梁承圣三年，554年）七月，他“亲帅步骑五十，夜至狗川。新罗伏兵发，与战，为乱兵所害”。圣王没有丧还新都泗谿，而是归葬旧都熊津乃父陵旁。一种可能，这是圣王生前的遗愿；一种可能，圣王被害之地狗川当在百济西部与新罗交界的边境，当时尚值酷暑，也不便于长途移运灵柩至新都，就近安葬在旧都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举措。要之，我们认为宋山里6号坟很可能就是武宁王子百济圣王的陵墓，而圣王妃则因故留葬在都城泗谿。

四 宋山里6号坟墓葬建筑工艺技术传统的复杂性

在《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一文中，笔者曾指出武宁王陵的构筑时代虽然相当于中国南朝的梁代，但其形制结构在不少方面却与南京地区的东晋晚期至刘宋时期的砖室墓葬比较接近，明显较南京地区同一时期南朝墓葬形制结构的演进迟缓。具体而言，武宁王陵使用的花纹砖、铭文砖、拼砌灯龕的特型砖其工艺传统显然来自于齐梁，而与墓葬形制结构直接有关的砌墓技术传统则可能源自元嘉以前的刘宋。

以上论断同样适合于宋山里6号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武宁王陵还要典型。研究表明，南京地区刘宋早期的大中型砖室墓葬如司家山永初二年（421年）谢纘墓，其形制结构与东晋晚期墓基本没有区别，甬道中仍设置木门，墓室底部仅设砖砌棺床^[39]。大约从刘宋中期的元嘉时代开始，以司家山1号墓为代表的大中型砖室墓葬的形制结构出现新的因素，甬道中虽仍设木门，但墓室砖砌棺床上发现有石棺座^[40]。这是墓葬制度由东晋向南朝转变的时期。时代为刘宋中晚期的隐龙山的3座砖室墓，虽然仍使用素面砖砌筑，墓室的前后壁仍为垂直上砌接顶的形式，且自东晋以降形成的直棂假窗与“凸”字形灯龕组合的形式也未改变，但砖砌棺床上已垫置石棺座，而且甬道中的木门也改易为石门，墓室侧壁及后壁均略向外弧凸，标志着南朝墓制的初步确立。丹阳的三座萧齐陵墓及南京郊区的萧梁宗室王侯墓则是典型南朝中晚期墓制的代表，即大型砖室墓不仅甬道中设置一道或两道石门，墓室砖砌棺床上置石棺座，墓壁普遍使用花纹砖或砖拼壁画、彩绘壁画装饰，侧壁及

后壁向外弧凸更加明显,开始流行火焰形灯龕与直棖假窗的组合。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在外观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墓室的前壁、后壁在基墙之上砌顶时因使用楔形砖、刀形砖起券,使之呈弧形向内卷抹,故其前部和后部的一段墓顶近乎穹隆形。南朝晚期的大中型墓葬,可以被推定为陈宣帝显宁陵的罐子山南朝墓为例,其墓室侧壁和后壁外弧更为严重,使整个墓室近似花瓶状^[41]。宋山里6号坟甬道中设一道木门,前后甬道的宽度和高度都不相同,墓室前后壁仍垂直上砌接顶。这些特点与前文列举的南京地区东晋至南朝刘宋早期的砖室墓葬别无二致,明显区别于与其时代相当的南朝晚中期墓葬,较之建康地区南朝墓葬形制结构演进的步伐慢了一个节拍,然而它的全部使用花纹砖的墓壁装饰“中方”、“急使”等类砖铭,特别是以特型砖拼砌而成的火焰形灯龕,都绝不见于建康地区刘宋以前的砖室墓葬,而与齐梁以降的大中型墓葬相似,又基本保持着与南朝墓制同步的节奏。

对于造成武宁王陵与宋山里6号坟上述这种墓葬形制结构复杂性的原因,我们曾给出解释,认为这两座墓葬的筑基和造砖匠师可能分属不同的工艺技术传统,前者很可能源于元嘉以前的刘宋,后者来自于齐梁,并从史料记载的角度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42]。其实,因文化传播造成的滞后性和复杂性,不仅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度之间发生,就是在同一国度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可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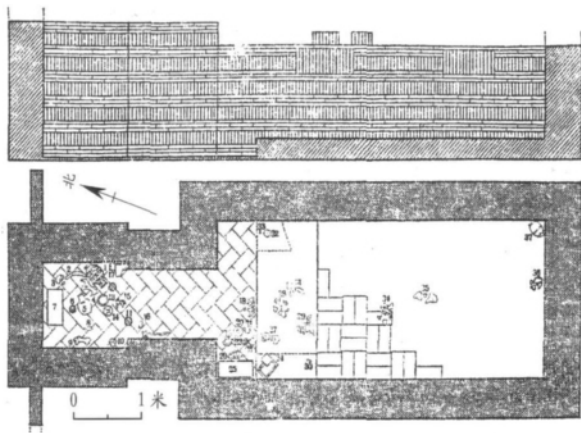
湖北武昌东北郊的何家大湾南朝墓就是这样一座典型墓例。这是一座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券顶砖墓,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砖室全长达8.4米。它的甬道中段原来可能设有木门,以木门为界把甬道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比后段略

宽。墓室中后部满铺砖砌棺床,墓壁平直,皆以三顺一丁组砖砌筑,左右侧壁和后壁共设5个直棖假窗,其中侧壁各2个,后壁为1个。因墓顶和上部墓壁不存,其直棖假窗上原来是否设置灯龕不明(图十一)。墓葬尽管早年被盗,但仍出土陶、瓷、铜、铁等质地遗物40余件。据其中一合陶质买地券可知,墓主为刘宋武陵王前军参军事刘凯,葬于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十一月^[43]。

这座墓葬的形制结构显然不属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东晋、南朝墓葬系统^[44],甚至与同时期的武昌东北郊的其他三座南朝砖室墓也大不相同。它在甬道中以木门分隔为前后两段的作法,墓壁上直棖假窗的形制、数量、位置,以及墓室后部满铺的砖砌棺床,都与南京地区东晋至南朝早期的砖室墓极其相似,因而可以划列为典型“建康模式”的南朝砖室墓葬系统。然而,有意味的是,这座墓葬的纪年虽为南齐永明三年(485年),但如前文所析,它的形制结构却颇具建康地区刘宋中期以前砖室墓之特点,也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滞后性和复杂性,个中原因当与墓主刘凯特殊的身份和个人经历有关。它虽与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构筑的复杂背景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类比,皆可证明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宋山里6号坟与武宁王陵墓葬形制结构的差异应该如何解释,前文已析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甬道的分段砌筑,棺床与棺座,以及墓室中直棖假窗与火焰形灯龕组合方式的不同等。关于前二者,显然与筑基工人的技术传统有关。两墓的修筑虽然可能都有南朝建康地区的工匠直接介入或间接参与指导,但肯定不是同一批工匠,甚至他们的技术传统也不完全相同;关于后者,则当与筑基工人的技术传统无关,而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变异造成的。武宁王陵时代相对较早,它完整地保留了建康地区南朝中晚期大中型砖室墓葬直棖假窗和火焰形灯龕的上下组合方式。宋山里6号坟时代相对较晚,因为在时空上都远离了传播源,才会发生直棖假窗与火焰形灯龕组合倒置的现象,可以想象与此墓砌筑有关的南朝工匠至少对这样一种组合方法已经陌生了。

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因时空阻隔发生的异化现象在南朝墓葬中也同样存在。如目前的考古材料可以证明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南朝墓葬中的直棖假窗是受建康葬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有迹象表明,两湖地区接受了下游建康的影响后,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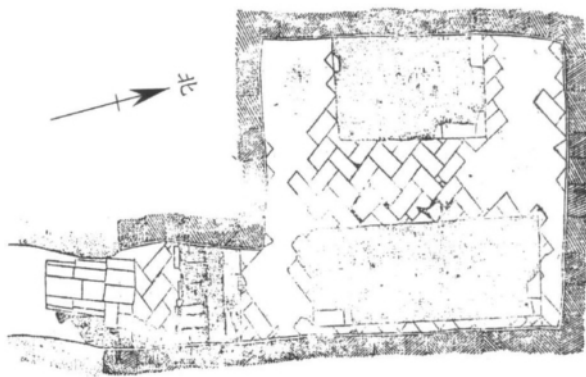
图十一// 武昌何家大湾南朝墓平剖面图

而把直棂假窗这种构造设施输出到广东地区。但是相对来说,两湖地区南朝墓中的直棂假窗比较接近建康地区,甚至还偶见与建康地区相似的与“凸”字形或长方形灯龕相配置使用的情况,而广东地区的南朝墓葬如罗定鹤咀山南朝墓^[45]、梅县梅程2号墓^[46]、揭阳揭山赤2号墓^[47]等虽常见直棂假窗,但其形制与砌筑位置已与建康地区相去甚远了。

五 砖室墓葬在百济古坟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百济古坟有积石冢、土圜墓、石室墓、砖室墓、瓮棺墓、火葬墓等多种类型^[48]。石室墓无疑是其中数量最多、类型最为复杂、使用最为广泛的墓葬类型。考古发现的石室墓中,既有不同规模等级的一般贵族墓,亦有被推定的百济王陵。《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云:盖鹵王听信高句丽浮屠道琳谗言,“取大石于郁里河作椁,以葬父骨”,可证传统葬制中的百济王陵确是一种石室墓。砖室墓在百济古坟中显得十分突兀,它不仅发现极少,除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外,只有校村里2号坟、3号坟等,而且仅局限于作为百济中期都城熊津的今公州地区,不见于百济早期都城汉城地区,也不见于百济晚期都城泗谿地区。此外,还有一类砖石混筑墓,如宋山里5号坟^[49]、29号坟(图十二)^[50]等,亦仅见于公州宋山里百济王陵区。此类墓葬作为古坟主体的墓壁及墓顶用石料构筑,但墓底铺地砖、棺座及排水沟却用与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相同的灰砖砌筑,显然是一种受砖室墓影响的新的墓葬类型。

百济古坟中砖室墓的突然出现,中、韩、日三国学者公认是受南朝特别是梁代葬制的影响。但是根据中、韩两国古代文献记载,汉城时代的百济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枕流王、腆支王、毗有王、盖鹵王等诸王不下18次先后遣使至立国建康的中国南方东晋、刘宋政权朝贡,文化交流的频率超过了南朝齐、梁、陈三代的总和,文化交流的内容可谓广泛而深入。泗谿时代的百济威德王也不下4次遣使至南朝建康的陈朝贡。但是,为什么这两座百济都城都没有发现砖室墓,而独出现于今公州地区呢?为什么砖室墓葬在百济古坟中只是昙花一现?显然,以往学界的解释过于粗略简单,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认为南朝“建康模式”的砖室墓葬在百济葬制中的植入,应与当时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背景有关,是某一特定时期百济与南朝政治外交关系密切化的产物,它的起因可能是百



图十二// 宋山里29号坟平面图

济东城王六年(南齐永明二年,484年)遣使中国南齐要求内属。

百济向南齐遣使要求内属,这一重要政治外交事件,中国方面文献没有记载^[51],仅见于《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东城王)六年春二月,王闻南齐祖道成册高句丽巨璉(即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遣使上表请内属。许之。”^[52]表面上看,这一政治外交事件与百济担心南齐对世敌高句丽的过高册封影响到自己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这种国际关系上的册封,竟使百济有如此之大的恐慌,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按照一般常识,如果不是危及国家生死存亡的突发事件,东城王断不致于匆匆举国内属于南齐。然而当我们把它与“魏伐百济”这一东亚国际军事冲突相联系,则上述疑问便豁然开朗。

我们先对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略加分析。史载百济长期未与北魏建立外交关系,直到5世纪下半叶,高句丽长寿王为了向南拓展,屡屡侵扰百济北境,百济形势严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472年,百济盖鹵王毅然首次遣使北魏乞师讨伐高句丽,并允诺臣服于北魏。然北魏考虑到高句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的友好关系,拒绝了百济欲结盟的要求,并派使者回访。使者邵安先为高句丽所阻,后从东莱渡海,又遇风不达而还。盖鹵王由此生怨,“遂绝朝贡”^[53]。475年,又发生高句丽兵围汉城,盖鹵王被杀的悲剧。此后,文周王虽南迁都城至熊津,但内乱频仍,积弱的国势未有改变,与北魏的关系亦未得到改善,乃至在东城王在位期间爆发了北魏大举讨伐百济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起因、胜负和时代,各方史料记载出入颇大,今人亦多争议。《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传·百济》记建武二年(495年)百济王牟大(即东城王)在给南齐的奏表中称:“去庚午年(永

明八年(490年),猓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奴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记:“东城王十年(南齐永明六年,488年),“魏遣兵来伐,为我所败。”《建康实录》卷十六则载:“永明二年(484年),魏虏征之,大破百济王并都。”^[54]关于战争结果,有百济获胜和北魏获胜两说,而战争发生的时间则有南齐永明二年(484年)、永明六年(488年)和永明八年(490年)三说。韩升先生曾著文对三说进行了分析,认为490年时当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崩。此乃国丧期间,北魏不可能大举讨伐百济,故排除了永明八年一说,而倾向于《三国史记》所载的永明六年一说^[55]。但笔者结合484年东城王突然上表要求内属南齐的记载,认为《建康实录》所记的永明二年可能更为接近事实。在北魏大举来伐、国难临头的紧要时刻,东城王以内属为条件转向南齐寻求结盟和支援完全可以理解。

百济内属于南朝后,为了表示效忠之诚意,执行了完全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在东城王、武宁王、圣王三王时代,彻底断绝了与大陆北朝诸政权的外交来往,而仅向建康的齐、梁政权朝贡。但到圣王之子威德王执政期间,随着中国南北朝力量对比的悬殊,百济可能放弃了原来内属南朝的国策,而改行更为灵活、实用的多面外交政策。这一时期,百济虽仍多次向南朝的陈遣使朝贡,但亦先后两次接受北齐后主的封拜,并于威德王十九年(陈太建四年,572年)首次入齐朝贡。此外,百济还先后四次入北周和隋朝贡,更于威德王三十六年(陈祯明三年,589年)遣使奉表贺隋平陈。要之,484年之后的东城王、武宁王、圣王时期,百济可能一度内属于南朝的齐、梁。

无独有偶,可称为典型南朝“建康模式”砖室墓代表的百济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的墓主正为前述内属时期百济三王中的武宁王和圣王,而其他与南朝葬制有关的罕见的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也都分布于内属时期的都城熊津。这不能不使我们推想所谓“内属”可能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外交辞令,而是包含着相关具体内容的制度规定和要求。换言之,以南朝葬制构筑百济古坟中高等级的砖室墓葬,很有可能就是内属时期的制度规定与要求之一。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内属时期,大约只有百济王及其他极少数身份特殊的百济贵族才被允许使用这种与南朝葬制有关的砖室墓。

其中最高等级者无疑是像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这样规模和形制的百济王陵,次一等级者应该是诸如校村里2号坟、3号坟等一类规模稍小的砖室墓以及以宋山里5号坟、29号坟等为代表的受砖室墓制影响的砖石混筑墓,而一般的石室墓则更等而下之了^[56]。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测,迄今尚未发现的内属时期的另一位关键的百济王——武宁王之父东城王的陵墓也可能采用了与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坟相类似的砖室墓葬形制结构。

(2007年12月,应韩国忠清文化财研究院及高丽大学韩国考古环境研究所之邀,笔者赴韩就此论题作过专题学术演讲。本文在此演讲稿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1]在《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一文中,笔者曾对武宁王陵与中国南方东晋、南朝墓葬从葬地选择、排葬方法到砖室形制构造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由于宋山里6号坟属于公州宋山里百济王及其宗室成员陵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此墓与武宁王陵在形制结构上存在不少相似性,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凡与该文内容相近者本文一般从略,而重点对宋山里6号坟形制结构的特殊性加以分析。参见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东亚考古论坛》创刊号,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第157~180页。又收录于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250页。

[2][14][50]轻部慈恩《百济美术》(东京)宝云舍1946年,第116~126、132~135页;轻部慈恩《百济遗迹研究》,吉川弘文馆1971年,第55~64页,大韩民国文化财管理局编《武宁王陵》(日语版),第1、86页,1974年。

[3]过去,笔者曾认为宋山里29号坟南侧的11号坟、12号坟也可能属于这一墓区。现在看来,它们所在的岗坡相对独立,与武宁王陵等墓所在的岗坡并不相连,故属同一墓区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

[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前新塘南朝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9]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晋墓清理简报》,

- 《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 [10]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尹西村六朝墓发掘报告》,《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1]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
- [12]轻部慈恩在《百济美术》和《百济遗迹研究》两书中记录这种灯龕为“舟形佛龕”,并推测龕内原来可能置有铜制如来立像,后因盗掘遗失。其实这种龕形构造据武宁王陵及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同类壁龕中放置的瓷质灯盏看,应是灯龕,其形状模仿的是灯焰,故笔者已在多篇文章中建议改称这类灯龕为“火焰形灯龕”。
- [1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15][30]《三国史记》卷二十五、二十六《百济本纪第三、第四》。
- [1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 [17]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发掘资料。
- [18][24][36]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95、281~295、112~114、123~124页。
- [19]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 [20]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 [21]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 [22]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 [23]河南南阳邓县学庄发现的南朝墓也是一座重要的砖画墓。不仅墓门有艳丽的彩绘壁画,而且墓内四壁嵌砌的大量画像砖上也都填染着色,然其题材内容庞杂,与本文讨论的主旨关涉不大,故恕不引。参见陈大章《河南邓县发现北朝七色彩绘画像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 [25]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94~98页。
- [26]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画像砖墓》,《文物》1985年第6期;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 [2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 [28]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姚家山东晋画像砖墓》,《考古》待刊。
- [29][42]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31][34]《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百济》。
- [32][55]韩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33]《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百济》。
- [35]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 [37]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铁心桥马家店村南朝墓清理简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38]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 [39]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六朝谢纛墓》,《文物》1998年第5期。
- [40]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 [43]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第4期。关于此墓甬道前后分段的原因,发掘简报未作说明。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甬道中部设置木门的缘故,木门易朽,故而不存。其旁发现的一根残长32厘米的铁钉,发掘者怀疑是棺钉,但这样长的棺钉不仅以往考古发现绝无仅有,而且也与棺钉数量一般较多的情况不符,故笔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用来固定木门的门钉。
- [44]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六朝墓葬的一般特点,可以参阅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32~137页。
- [45]罗定县博物馆《广东罗定县鹤咀山南朝墓》,《考古》1994年第3期。
- [46]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
- [47]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揭阳东晋、南朝、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 [48]大韩民国文化财管理局编《武宁王陵》,第83~87页。
- [49]轻部慈恩《公州に於ける百济古燼(四)》,《考古学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五号,1934年5月。
- [51]今存《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传》很不完整,脱《高丽传》之下半篇、《百济传》之上半篇,很可能有关百济内属的内容就在脱漏的范围之内。参见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1019~1020页校勘记第5条。
- [52]东城王六年即南齐永明二年,484年。据中国方面文献记载,这一年在位的是南齐的武帝萧赜,高帝萧道成已经死亡两年,故《三国史记》的这条记载尚需考订。
- [53]这一事件的经过详见《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又见《魏书》卷一百《百济传》、《北史》卷九十四《百济传》。
- [54]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4页。此处“弁都”当为“牟大”之误,即东城王。
- [56]内属时期百济葬制中的等级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复杂问题,拟将作专文讨论。